英汉同声传译的变量考察

——基于对同一场电视直播的三位职业译员同传的观察研究

王斌华 香港理工大学 古煜奎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摘 要:本研究观察三位职业译员对同一场电视直播现场同声传译的口译产品,以考察英汉同声传译的主要相关变量。通过对口译产品中出现的错误、省略和不当语言表达现象的定量分析,发现省略在电视同传中出现频率较高,而错误和不当语言表达则较少出现。归因分析发现:1)现场认知处理条件的制约是造成英汉同传中省略、错误和不当语言的重要原因;2)省略数量与等待这一同传策略相关;3)省略频率较高而错误频率较低亦与译员"自我保护"的口译规范有关;4)语言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英/汉同传中的困难。由此可见,要建立解释英/汉同声传译的口译理论,应综合考量口译能力、现场认知处理条件、口译规范和语言特殊性四个方面的变量。

关键词:英汉同声传译;相关变量;口译能力;现场认知处理条件;口译规范;语言特殊性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73X (2014) 06-0019-05

1. 研究背景

综观口译研究的实证成果,研究对象多关注口译过程,而对口译产品的关注不够;研究方法多采用实验法,而对口译现象的观察描写不够。作为翻译学中一门年轻的子学科,口译研究亟需理论基础的建构,而理论建构有赖于对各种真实的口译现象进行充分和系统的观察研究,以建立描写性的基础。

就研究对象而言,在研究口译过程和口译产品 (或称口译表现)时,应全面考量其相关变量,并对 有一定规模的语料数据进行全面考察和分析,方可 达至充分的描写及合理的解释。口译过程和口译产 品的相关变量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1) 译员能力; 2) 口译现场认知处理条件; 3) 口译规范(Wang, 2012)。译员能力包括双语能力、背景知识和口译技 能,决定了现场口译行为和表现的潜势(potential)。 口译现场认知处理条件包括现场工作条件、发言人 的语速和口音、源语信息密度和内容难度等。口译 规范是口译职业群体以及口译服务对象群体共享的 价值和观念,是内在化的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 现场口译的各种策略和译员的各种决策(王斌华, 2013:78-79)。另外,在英/汉、英/日、英/德等句 法结构和文化概念差异较大的语言组合之间的口译 活动中,语言特殊性(language specificity)亦是口 译过程和口译产品的一个影响因素(Wilss, 1978; Uchiyama, 1992; Setton, 1993; Gile, 2004)

从研究方法来看,口译的实证研究方法主要是实验法和观察法。实验法模拟口译任务对受试进行测试,对实验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观察法则是对现场口译活动进行观察,由此收集的分析数据被 Gile (2011:202)称为"自然数据"(naturalistic data)。实验法可

以控制相关变量,但其缺点在于实验任务不容易达到口译研究所要求的"生态效度"(ecological validity)。相比而言,观察法则可以最大程度获得真实的口译现场数据,确保"生态效度"。由于口译现场数据较难获得等原因,观察法在口译研究中远未得到充分的使用。在此背景下,运用观察法进行口译研究尤为必要,而且此类研究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能为后续[实验]研究提供可供验证的假设"(Gile, 2011: 202)。

2. 研究问题

本研究旨在系统考察英汉同声传译的主要相关 变量。针对此研究目的,我们就三位职业译员对同一 场电视直播现场同传的口译产品中出现的错误、省 略和不当语言表达现象进行观察、描述和分析。衡 量口译产品和表现的参数通常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语言和发布。内容参数指译语是否准确地传递了源 语的信息和讲者的意图之义;语言参数指译语在表 达方面是否得体并符合目标语言的表达习惯;发布 参数则是指译语语流是否顺畅,是否存在有声停顿、 无意义重复等影响流畅性的现象(王斌华, 2013: 81)。错误和省略现象属于内容方面,不当语言表达 现象属于语言方面。限于篇幅,本研究暂不讨论目 标语发布问题。我们主要探究两个问题:1)三位译 员现场口译中出现的省略、错误和不当语言表达有 什么特点?译员之间是否存在个体差异? 2)造成 省略、错误和不当语言表达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为了回答上述研究问题,我们对口译语料的译语与源语进行平行对比分析,标注其中的错误、省略和不当语言表达现象,进而对这三类现象进行统计,并在译员之间进行对照分析,通过定量描述和定性分



析得出结论。

3. 研究语料

相较前人研究,本研究语料的代表性更为充分。前人研究的数据通常是一位译员对一场演讲口译的语料,而本研究则包含三位职业译员对同一场演讲口译的语料。因此,本研究可望得出更具代表性的结论。

语料源语是奥巴马 2009 年宣誓就任美国总统时的演讲。演讲全长共 18 分钟,平均语速为 133 词/分钟,按照"国际会议口译协会"(AIIC)关于同传中源语语速不宜超过 120 词/分钟的标准,该演讲的语速较快。另外,源语发言属于比较正式的语篇,句式和词汇比较复杂,同时还包含一些修辞手法,如运用比喻、引用名言等。

口译语料来自三家知名的中文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和台湾无线卫星电视)三位职业译员(下文简称译员一、译员二、译员三)对奥巴马演讲电视直播的同声传译。由于三位译员均是知名电视台的职业译员,译员能力在本研究中属于控制的变量。

源语和目标语语料经过录音转写后进行了句对齐。为了统计三位译员同传中出现的省略、错误和不恰当语言表达的数量,我们根据意义和信息单位把源语切分成 158 个意群,以对比观察译语中译员在每个意群的处理上是否出现省略、错误或者不当语言表达的情况,然后在译语文本中分别用 O (omission)、E (error)和 I (infelicities)对省略、错误和不恰当语言表达进行了标注(参见 Gile, 2011)。

4. 数据分析和讨论

4.1 同传中的省略、错误和不当语言表达

4.1.1 同传中的省略及其成因

前人文献多把省略当成一种口译策略来研究(如Napier,2004),即译员为减少同传中的认知负荷而采取省略次要信息的策略。实际上,省略可能是译员有意为之的策略,也可能是不得已的行为。在本研究中,我们把省略看作是同传产品和译员表现中的一种现象,其主要关涉的是内容,即那些在源语中出现但在译语中未出现的信息和意义。在源语-目标语对比分析和语料标注中,我们根据每个意群中省略的内容多少将其细分为两个子类:全部省略(标注为O)和部分省略(标注为Op)。关于同传中省略的成因,可能与译员的主动应对策略有关,如在发言人口音过重或源语句式过于复杂时,译员为了更充分地理解源语意思多采取等待策略,但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滞后时间(EVS)过长并导致记忆负荷过大,译员为了做到

同传的同步性并确保自身的处理能力不会透支,往往会选择省略那些自己认为比较次要的信息。省略也可能是译员因为缺乏足够的语言知识或言外知识而造成理解问题,从而导致被动的省略(Gile, 2011: 206)。有研究者指出,省略是同传中非常有效的策略,无论是主动的选择还是被动的放弃,省略都是为了保证同传的整体质量(张凌, 2006)。

4.1.2 同传中的错误及其成因

在本研究中,错误指的是译员虽然将某个意群翻译出来,但意思却与源语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根据程度不同,我们将语料中的错误细分成两个子类:主要错误(标注为 Em)。同传中的错误可能是因为译员缺乏语言知识或背景知识,或因源语语篇比较复杂、用词比较正式,译员理解不到位而造成错误。有时译员也会将简单的信息译错,这可能是由于其它地方所需的认知处理负荷过高,造成了译员的精力透支,从而产生错误。比如译员因为滞后时间过长造成记忆负荷过重,可用于听辨理解的精力接近透支,以至于即使是正常情况下很容易听懂的内容也可能出现错误。

4.1.3 同传中的不当语言表达及其成因

本研究中的不当语言表达指的是,译语意思与源语相符但语言表达不符合目标语表达规范和习惯的现象。与省略和错误相比,不当语言表达现象(特别是在译入母语的情况下)更加能够说明译员认知处理出现了超负荷。Gile (2011:206)指出,"语言正确性是很多翻译学院教学中的一项重要准则",为了遵循这项准则,职业译员在认知负荷过大的情况下,会"省略部分信息以确保产出的语言合乎语法"。因此,如果译员在译入母语的时候出现语言表达不当,可以说明译员的认知处理能力已接近透支。不当语言表达也可能是因为译员受到源语句式结构的影响,虽然理解了源语的含义,但在口译转换中出现了负迁移,造成了译语的不当表达。

4.2 语料中省略、错误和不当语言表达的定量 分析

我们对三位译员在158个意群传译中出现的省略、错误和不当语言表达现象进行了标注和统计。关于标注的定性和分类需要说明的是:鉴于省略和错误同属于内容范畴,我们先标注和统计省略现象,如果某个意群被译员省略了,就不计入错误现象;不当语言表达属于语言范畴,在统计中与前两类现象虽有交叉,但并不冲突。换句话说,在出现错误和部分省略的意群中,也可能出现语言不当现象。

通过统计三位译员同传语料中省略、错误和不当语言表达现象的数量和频率(表1),我们发现:电视同传中省略是较为普遍的现象,三位译员的省略频率分别约占意群总数的20%、30%、40%;错误和不当语言表达则较少出现,频率分别占意群总数的5-9%和1-4%。

表 1: 三位译员同传中省略、错误和不当语言表达 的数量和频率

省略		错误	不当语言表达	
译员一	46 (29%)	10 (6%)	7 (4%)	
译员二	30 (19%)	15 (9%)	2 (1%)	
译员三	61 (39%)	8 (5%)	7 (4%)	

首先,我们来看语料中省略现象的统计。如表 1 所示,译员三省略最多,是译员二的两倍,译员一的省略数量居中。通过对源语 - 译语逐行同步对齐 (interlinear synchronization)的分析以及对停顿时长的标注统计,我们发现三位译员的省略数量与其口译策略的选择不同有关:译员三倾向于采取等待策略,译员二倾向于采取断句策略,译员一对两种策略的选择则相对比较平衡(见例1:表2)。

从例 1(表 2)可见,其中的源语句子无论是词汇还是句式都比较复杂:词汇方面,包含了"proclaim"、"recriminations"和"dogmas"等比较正式的词汇;句式方面,该句子属于英语中常见的定语后置式句子,其定语成分("that for far too long have strangled our politics")放置于一系列先行词"the petty grievances and false promises, the recriminations and worn out dogmas")的后面。这种句式结构与中文的定语前置结构有很大差异,给译员的理解和译语表达带来困难。译员一和译员二都采取了断句策略([S]),即将源语中一系列先行词先翻译出来,然后另起一句翻译后置的定语成分。译员三则采取了等待策略([W]),等待了长达 4.99 秒的时间,导致了较长的省略。我们将这种策略选择与省略数量的统计结果比照后发现,译员使用等待策略时出现的

例1:表2

ST	On this day,	we come to proclaim an end	to the	petty	grievances	and false promises, the recriminations	and worn out dogmas	that for far too long have strangled	our politics.	
TT1		在	这里		<1.62s>我们	要结束		从前的一些 (,相互的怨	<1.1s>	因为这 些原因 导致我 们政治 的不和。
TT2			在今天			<1.23s> 我 们 要克服	-	剋怨和不切 诺<1.3s> [S]	这些<0.6s>都 们政治方面的	
TT3				<4.99s>		今天我们不要指责, 我们不要发布[Wp]		发布…发表 太多的…我 们不要发表 假的承诺。		

省略比使用断句策略时要多。

在错误数量方面,三位译员的错误都不多,译员 三错误最少,在158个意群中,只有8个意群出现了 信息错误,译员一和译员二分别在10个和15个意群 中出现了信息错误。对比省略和错误的数量,一个有 意思的发现是,无论从总量还是从每位译员的数量 来看,省略的数量均远远大于错误的数量。一方面, 这与电视同传的时间限制所造成的认知处理压力以 及同传译语必须与源语保持同步性的工作要求有关; 如果说错误是译员无法控制的后果,省略则是译员 为减轻认知负荷及保持同步性而主动采取的策略或 者被迫作出的应对。另一方面,这也许与译员"自 我保护"(Self-preservation, 参见 Monacelli, 2009) 的口译规范相关,相对于省略,错误更容易暴露在目 标语听众面前,从而导致用户评价中对译员不利的 后果。因此, 在现场同传中, 译员倾向于省略而不是 说出自知可能是错误的信息。

为判断省略和错误的程度,我们对省略和错误的子类作了进一步的统计(表3)。在省略方面,三位译员的全部省略数量均多于部分省略。错误方面的数据也呈相似的趋势,即主要错误的数量多于次要错误。一方面,这说明即使是高水平的职业译员,在电视同传现场认知处理条件的制约下,也会出现严重的省略和错误问题。另一方面,也证明了虽然口译行业的规定性规范要求译员"不能有任何省略、压缩或改变"(王斌华,2013:139),口译现场的实际规范和规定性规范存在一定的偏离。

表3:三位译员不同类型的省略和错误的数量

	全部省略	部分省略	主要错误	次要错误	
译员一	33	13	7	3	
译员二	24	6	9	6	
译员三	53	8	7	1	

在不当语言表达方面,三位译员均出现得很少, 仅为总意群数量的 4%、1% 和 7%(见表 1)。一方

> 面,这说明作为有资格担任 三大中文电视台直播同步 下中文电视台直播同步 本不存在问题。语言能力基 本不存在问题。语言能力 提和基础,"语言正确性是 很多翻译学院教学中项重要准则"(Gile, 2011: 206)。但从另一个角度来 看,为什么职业译员在语言 进行的出现不当语过进 时仍出现不当通过进象的 成因。



5. 同传中的省略、错误和不当语言表达的成因 分析和讨论

通过三位译员语料的观察,我们发现造成省略、错误和不当语言表达的主要成因来自两个方面:现场认知处理条件的制约和语言特殊性。现场认知处理条件包括:1)现场的声音输入和视觉可见度,指译员是否能够清楚地听到发言和看到发言人和现场的情况;2)发言人的口音和语调,指发言人是否有口音及语音、语调是否标准;3)发言语速和发言方式,指语速快慢和发言方式是即兴演讲抑或是读稿;4)源语语篇的复杂性,包括演讲语篇的信息密度、词汇难度和语篇类型等(Pöchhacker,2004:126-131)。语言特殊性指的是英语和汉语在句法结构和文化概念等方面的差异。

5.1 现场认知处理条件的制约

首先,我们来看现场认知处理条件制约对同传产品的影响。就条件1而言,本研究中译员是在电视台直播室进行的远程口译(remote interpreting),因此在对演讲现场的视觉可见度方面受到制约。就条件2而言,本研究中发言人的口音和语调属于比较标准的美国英语,因此这一条件应该不会形成对同传的制约。就条件3和4而言,该演讲显然是带稿的现场发言,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同传的难度。

为了找到共性和规律,我们抽取三位译员均出现 较多省略、错误和不当语言表达现象的同一语段进 行分析。

例 2: 源语: ① And those of us who manage the public's dollars ② will be held to account ③ to spend wisely, ④ reform bad habits, ⑤ and do our business in the light of day, ⑥ because only then ⑦ can we restore the vital trust between a people and their government.

译语一: ① <O> ② <O> ③我们所有的联邦的钱都要明智地花 <I>。④ <O> ⑤ <O> ⑥因为只有这样⑦我们才能够恢复公众对于政府的信心,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译语二:①<O>②<O>③我们的公共资金将会明智地进行支付<I>。④<O>⑤<O>⑥因为只有这样,⑦我们才能够恢复人们和政府之间非常宝贵的信任。

译语三:①我们在管理这个公共经费的人,② 我们必须全力地负责任,我们必须全程来负责任。 ③ <O> ④ <O> ⑤ <O> ⑥ <O> ⑦我们才能恢复民众 对政府的信心。

在例 2 中, 三位译员都省略了四个意群。对于同传译员而言, 该源语语段至少有三项认知处理条件的制约, 包括信息密度、词汇转换难度和发言语速。从信

息密度来看,源语句子比较长,而且意群三、四、五属 于排比列举,信息密度很大。从词汇转换难度来看,虽 然源语用词理解难度不大,但却存在较大的转换难度, 比如 "manage the public dollars"、"spend wisely"、"reform bad habit"和"do our business in the light of day"。以"spend wisely"为例,译员一和译员二在转换时都出现了不当 语言表达的问题,分别译成"明智地花"和"明智地 支付",说明在这个短语的转换表达中两位译员都消耗 了较多的精力,以至于省略了后两个意群。译员三则 采取了等待的应对策略,导致滞后时间过长,加上在 翻译第三个意群("will be held account to")时出现了 不必要的重复,导致了后面连续四个意群的省略。从 源语语速来看,发言人这一语段的语速高达 197 词/ 分钟, 远远超过了国际会议口译协会(AIIC)关于同 传中源语语速的标准,也高于发言人整场演讲的平均 速度(133词/分钟)。由于上述三个因素在该语段的 复合叠加,导致了同传译员认知负荷过载,因此,三位 译员均在该语段出现了较多的省略和不当表达等口译 问题。

5.2 语言特殊性对英/汉同传的影响

例 3 中省略和错误的密集出现, 说明三位译员在 同传中遇到较大的困难。我们分析发现,这里影响 译员表现的有两个主要因素:源语语速和语言特殊 性。一方面,本段发言人的语速达到了194词/分钟, 同上例一样远远超过了同传中源语语速的标准,给 译员造成了较大的认知处理负荷。另一方面,从语 言特殊性来看,源语句子包含了多个置于中心词之 后的(right-branching)定语从句,这与目标语(汉语) 的句法结构有很大的差异,汉语中的定语(包括长的 定语)通常置于其修饰的中心词之前(left-branching)。 由于同传这种口译方式要求译员采取译语—源语线 性同步的工作方式,这种语言结构差异给同传译员 造成了较大的困难和问题。本例源语语段包含三个 定语从句, 三位译员在翻译这些定语从句时都出现 了不同程度的省略和错误。译员二不仅省略了第二 个定语从句,还省略了其修饰的中心词("from the grandest capitals to the small village"); 其他两位译 员除了省略外,还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错误,如译员一 将最后一句 "we are ready to lead once more" 译成 "我 们愿意和你们一起努力", 译员三则将"America is a friend of each nation and every man"错译成"美国是 一个和平的国家"。由此可见,语言特殊性是英/汉 同传中造成省略和错误的一个重要因素。

例 3:源语: ① And so to all other peoples and governments ② who are watching today, ③ from the grandest capitals to the small village ④ where my father

was born, ⑤ know that America is a friend of each nation and every man, woman, and child ⑥ who seeks a future of peace and dignity, ⑦ and that we are ready to lead once more.

译语一: ① <Op> ②对全世界在看我们的人们, ③不管是来自于哪个首都④ <O> ③不管是在大城市 还是在小城市, ⑤ <O> ⑥只要你们希望有尊严有和 平, ⑦我们愿意和你们一起努力 <E>。

译语二:①②对于所有观看我们演讲的政府和人民来说,③<O>④<O>⑤美国是每一个国家<Op>,⑥每一个人争取自由和尊严的人们的朋友。⑦我们愿意再一次作为世界的领袖。

译语三: ① <Op> ②我们针对全球…各国…各国的观众在看今天这个…这个演说, ③ <O> ④ <O> ⑤ 我要让你知道, 美国是一个和平的国家 <E>, ⑥我们美国是一个可以让任何人成功的地方 <E>。⑦而且美国已经有准备好要重新领导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 Gile (2011)同样采用本场奥巴马就职演讲的现场电视同传为语料,观察了英/法、英/德和英/日三个语对中多位职业译员的表现,发现在不同语对中平均每位译员出现的省略和错误总数有明显差异:英/法译员最少,英/德译员居中,英/日最多。Gile 认为其发现证实了"语言特殊性确实会对口译难度产生影响"(Gile, 2011: 213)。本研究关于英/汉同传中错误和省略的统计结果(表3)则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结论,并增加了英/汉语对的实证数据。从语言属性看,属于汉藏语系的汉语与属于印欧语系的英语在结构上有明显差异,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同一篇演讲的同传中,本研究中的省略和错误数量要远远大于英/法和英/德两个语对中的数量。

表 3: 本研究省略和错误统计结果与 Gile 研究的对比

	Gile 的	本研究		
口译语言组合	英 - 法	英 - 德	英 - 日	英 - 汉
错误和省略平均值	13.7	25.5	42.2	56.7

6. 结论

本研究对三位职业译员对同一场电视直播现场 同传的完整语料进行了系统研究,定量描述了他们 口译产品中的省略、错误和不当语言现象,并且对这 些现象进行了成因分析。

我们发现,省略在电视同传中出现频率较高,错误和不当语言表达则较少出现。归因分析发现:1)现场认知条件的制约是造成同传中省略、错误和不当语言的重要原因。即使是职业译员,由于各种现场认知处理条件的制约,也会出现省略、错误和不当语言表达的现象;2)译员的省略数量与等待的同传策略存在一定关系;3)省略频率较高而错误频率

较低与电视同传的认知处理压力相关,亦与译员"自我保护"的口译规范有关; 4)语言特殊性会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英/汉口译中的困难,导致省略、错误和不当语言表达的出现,这进一步验证了前人研究(Setton, 1993; Gile, 2004等)关于语言特殊性在某些语言组合口译产品中作用突出的论断。

综上所述,英/汉同声传译涉及口译能力、口译现场认知处理条件、口译规范和语言特殊性四个方面的变量。要建立解释英/汉口译行为、口译产品和口译活动的口译理论,应综合考量上述变量。

基金项目: 本研究得到香港理工大学 GRF 项目的资助(项目号 G-UA92), 谨致谢忱。

参考文献

- [1] Gile, D. 2004. Issues in research into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A]. In Kittel, Harald, Armin Paul Frank, Norbert Greiner, Theo Hermans, Werner Koller, José Lambert, Fritz Paul (eds.). A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Volume I. Berlin &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Article 83. 767-779.
- [2] Gile, D. 2011. Errors, omissions and infelicities in broadcast interpreting. Preliminary findings from a case study [A]. In Alvstad, Cecila, Adelina Hild & Elisabet Tiselius (eds.). Methods and Strategies of Process Research. Integrative approach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1-218.
- [3] Napier, J. 2004. Interpreting omissions. A new perspective [J]. *Interpreting*, 6 (2): 117-142.
- [4] Monacelli, C. 2009. *Self-preservation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Surviving the role* [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5] Pöchhacker, F. 2004. *Introducing Interpreting Studies*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6] Setton, R. 1993. Is non-intra-IE interpretation different? European models and Chinese-English realities [J]. Meta, 38 (2): 238-256.
- [7] Uchiyama, H. 1992. The Effect of Syntactic Differences on English-Japanese Interpreting: Premodifying Adjectives in English [J]. *The Interpreters' Newsletter*. Special Issue No. 1: 52-59.
- [8] Wang, B. 2012. A Descriptive Study of Norms in Interpreting: Based on the Chinese-English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Corpus of Chinese Premier Press Conferences [J]. *Meta*, 57 (1): 198-212.
- [9] Wilss, W. 1978. Syntactic anticipation in German-English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A]. In Gerver, D. & H.W., Sinaiko (eds.), Language Interpre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 New York: Plenum Press, 343-352.
- [10] 王斌华. 2013. 口译规范的描写研究——基于现场口译较大规模语料的分析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11] 张凌. 2006. 省略对同声传译质量的影响 [J]. 中国翻译, (4): 10-15.

[作者简介] 王斌华,博士,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翻译研究中心助理教授(研究),研究方向:口译研究;翻译研究。

古煜奎,博士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 院讲师。研究方向:口译研究。

[作者电子信箱] wangbinhua@hotmail.com; gyk8111@163.com